

乡村振兴视域下山区新型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围

——基于湖北省宣恩县 M 村的调研

孙艺宁¹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1)

【摘要】: 探索山区新型农民培养实践, 为优化乡村振兴路径提供参考借鉴, 以湖北省宣恩县 M 村为例, 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结果表明, 山区新型农民利用已有技术发展特色产业、依托资源发展旅游产业, 初具市场意识, 但仍然无法突破思想文化素质低、身体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及市场意识薄弱的困境。提出通过整合教育资源, 助推乡村振兴; 完善医疗设施, 助力乡村振兴; 重建村社组织, 助阵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山区新型农民培养 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 农村发展的中心任务从精准扶贫转为乡村振兴, 新型农民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有学者对新型农民培养给予了关注和分析, 新型农民培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1], 要高度重视新型农民的教育问题, 将其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2]。也有学者提到了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3]以及后脱贫时代的平衡发展^[4]。但多数学者忽视了山区农民地处山区这一特殊性, 致使在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存在诸多难以预料的困境。山区新型农民培养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 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根本保障, 山区新型农民培养的经验能更好的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对湖北省宣恩县 M 村的新型农民培养经验进行调研时发现了一些困境, 突破困境才能更好的实现乡村振兴。鉴于此, 以湖北省宣恩县 M 村为例, 探讨山区新型农民培养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以期对山区新型农民培养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区新型农民培养现状

M 村是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村, 南距宣恩县城 10km, 北距恩施州府 33km, 209 国道穿村而过。全村共 12 个村民小组 556 户 2084 人, 其中土家族、苗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 70%以上。由于地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 M 村发展受到限制。黄金梨为村主导产业, 种植面积达 163.33hm², 以此为依托, M 村发展起以“赏花、摘果”为主题的特色旅游业。在村支书带领下成立了合作社, 引导农民掌握黄金梨种植技术、开拓黄金梨销售渠道, 成功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较好成绩。

1.1 掌握技术, 特色产业发展

培育新型农民是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民。懂技术是新型农民的重点, 传统农民的生产工具中没有大型机械设备,

作者简介: 孙艺宁(1997-), 女, 山东威海人, 助教,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主要利用人力和畜力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新型农民大多使用现代机器进行机械化生产。

懂技术，一方面是要要求新型农民能够使用现代化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也要求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所学科学技术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去。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只有懂技术，才能切实提升农业产量质量，才能最大程度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只有培养出大批懂现代农业知识、会利用新型科学技术的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会出现新契机，乡村振兴才有希望。M村利用行政区域地处半山腰、山顶的地势条件相继发展了西瓜产业、蔬菜种植业以及黄金梨产业，在县域范围内率先实现脱贫。M村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有黄金梨，黄金梨的种植和培育技术对农民的技能要求较高，村民在村书记的组织和教学下学习了专业种植培育技术。M村发展产业以前，因为地处山区，是脱贫重点帮扶村落。经过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摸索，科学技术与地理环境得以结合，从而将脱贫攻坚路上的阻力转变为发展的动力源泉。

1.2 资源依托，旅游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山区农村发展特色旅游业不仅拥有独特资源优势，而且满足了人们不断发展变化的旅游需求，优美的自然环境及宜人的气候，使得一年四季多数时间都适合旅游。而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更是山区农村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坚实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居民开始倾慕乡村田园式生活方式，利用假期到乡下体验乡村生活，乡村旅游随之走上休闲化的道路。以周边城市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融合游客的多层次旅游需求，乡村旅游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业产品和自然风景观光，一方面为观光游客提供参与式项目体验及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发展势头旺盛。推动山区农村特色旅游业发展，要立足自身、充分依托和发挥山区农村资源极其丰富的优势，善于将其与民族特色相融合，不断给游客带来独特的旅游体验、制造令游客难忘的旅游记忆。与此同时，发展与旅游业相适应的服务业，不断延伸产业链以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确保山区农民收入持续稳定上升。M村因地制宜，积极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特色旅游业。依托种植的大片黄金梨，利用靠近县城的地理优势，该村在每年春季梨花盛开时举办赏花节，吸引了县城及附近村庄大量游客前往观赏游玩。为发展这一特色旅游产业，村民们积极配合村委会的行动。为解决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村内交通阻塞问题，张某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让出了自家0.12hm²梨地以拓宽村公路，极大改善了村内交通状况。以村特色旅游为支柱，M村陆续新开一批民宿、餐馆以及超市，村民经营性收入不断增长。

1.3 竞争激烈，初具市场意识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新型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市场意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满足乡村振兴发展所需人才的标准。

新型农民市场意识主要包括市场参与意识、市场竞争与合作意识、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市场风险意识以及经营意识、诚信意识、质量意识和信息意识等^[5]。新型农民市场意识的培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市场环境下的相互竞争，新型农民自身素质得到很大提升，从而对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生重大推动作用，最终影响农业效益和竞争力。M村村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意识。在梨树的培养过程中，村民们精心管理梨树，从梨树的培育、剪枝、开花、结果到最后摘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就是为了使得产出的黄金梨个头适中、外无杂质，在市场上具有更好的销路。目前，M村的特色产品黄金梨不仅成为武汉、上海等地的热门商品，还通过网络远销欧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是新型农民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新型农民的本质就是“农商”^[6]。

2 山区新型农民培养面临的困境

山区新型农民培养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任重道远。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新时代后，新型农民的培养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目前山区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 思想文化素质低

农民思想文化素质低，主要表现在思想道德素质低和科技文化素质低。新型农民应该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具体行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人所处社会的文明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培育出一批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新型农民。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新型农民才会密切关注国家大政方针，深入了解国家的农村政策，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山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低下，主要是受地理封闭性、传统文化以及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影响造成的自身保守性。山区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旧过着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他们对外界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持抵制情绪。农业社会的静态内向使地域封闭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对其有强烈的归附意识^[7]。过于保守，不仅不利于农民自身的发展，有时也会妨碍集体前进。宣恩县N村为方便村民出行，提升村庄整体形象，计划修筑一条环河公路。环河公路侵占了李某部分土地，李某对此坚决抵制，导致该公路目前仍未完工。部分农民过于保守的现状，为新型农民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

现阶段山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质量不高，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程度低的低素质人口众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府一系列政策也随之偏向城市，城市地区的教育资源、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开始与农村呈现“两极分化”局面。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村教育问题再次被忽视，城市教育资源与农村进一步拉大差距。国家投资不足是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农民中广泛存在的“读书无用论”也是农村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的一大原因。贫困地区很多家庭送孩子上学只满足于简单的加减法计算、“识得几个大字”，没有更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追求。受教育意识薄弱，自身积极性不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升非常困难。内生动力不足是山区发展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2.2 身体素质过低

新型农民本质上仍属于农村劳动力，劳动力素质除了具备文化知识、劳动技能、市场意识之外，还应包括劳动力自身的健康程度，如果健康难以保证，农民就不能成为现实的农村人力资源^[8]。农民身体素质差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作效率和农业生产发展，进而阻碍乡村振兴目标的顺利完成。山区农民身体素质过低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山区农民较差的生活作风及其接触到的事物多偏向原生态是产生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农村卫生水平过低则是山区农民身体素质低下的关键所在。我国卫生资源发展呈现两极分化局势，地域面积广阔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极为匮乏，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地区，“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威胁着山区农民的健康。而且，西部山区乡镇大都面临财政困难的窘境，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且逐年减少，山区农村医疗卫生水平进一步恶化。山区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起步，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集体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消失，农民普遍看不起病。“小病磨，大病拖”的现象在山区农村十分普遍，山区农民身体素质大大下降。据统计，1987年，农村劳动力身体素质较好以上、较差和非常差的农民占比分别为59.4%、6.0%、3.0%，到了2002年这一比例则分别是45.1%、13.0%、1.0%^[9]。

2.3 法律意识淡薄

较多对新型农民的研究是建立在农民是合格公民的假设基础之上，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有较多农民还不是合格的公民，属于“残缺的公民”，身上缺少一些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特征^[10]。农村居民拥有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是新型农民的一个重要标志^[11]。

从山区农民到现代公民转变的关键是两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山区农民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都比较低，“长老统治”在山区农村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公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山区农民法制观念薄弱、法律无法发挥完全作用，是其不能有效处理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从而破坏了农村社会经济和谐的和谐环境，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行。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坚阶段，必须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使农民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并履行法律义务，不仅遵守法律，还有用法律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自觉性。

2.4 市场意识薄弱

山区农民的市场意识具有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敏感程度低、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山区农民诸多市场行为具有盲目跟随的性质，“今年辣椒价格贵，来年就会出现大量农民种植辣椒，最终导致辣椒价格下降”。

山区农民市场意识的萌发基于生存需要而非发展需要也是市场意识薄弱的体现。计划经济时期，剩余劳动力可以不断投入到农业中，劳动力过剩表面上看不出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开始凸显，随着农业收益不断减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思考生计问题。于是出现了进城打工、兼业等现象，但这些行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农民进入市场经济是被迫的，市场意识的产生也非主动。

山区农民市场经营能力差，经营方式呈现固化、单一化，缺乏多样化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前，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食用及缴税，人们知足常乐，只求温饱不成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农业生产的目的逐渐发生改变，一批职业农民开始出现，他们将所生产的农作物拿到市场上售卖以获取利润，出售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山区由于地形封闭、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市场经营方式仍然单一。M村于21世纪初开始发展黄金梨产业，每到梨子成熟的季节，多数农户除将熟果拿到国道旁和集市销售，再无其他销售方式了。山区农民市场经营能力差，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3 山区新型农民培养的路径选择

山区农村的自身条件短时期内很难改变，但乡村振兴的步子不能停，新型农民培养的大政方针不能变。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必须始终坚持政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大众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不断改善山区农村发展的条件，这是缓解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的出路。针对山区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3.1 整合教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农村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高质量人才的建设和引进问题。广大农村区域仅仅凭借基础教育很难获取高质量人才，各级各类教育要承担起为乡村振兴培养相应人才的责任，为乡村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要实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移到依赖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一轨道上，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教育投资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从长期看来，教育投资的作用巨大。

第一，通过教育提升农民公民意识，增强农民法制观念。接受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得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思想，从而改变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局面。这一过程中，农民固有的标签得以不断去除，越来越符合现代公民的特征。农民对待法律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既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也懂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第二，通过教育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积极性。新型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有赖于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乡村教育近年来虽然受到国家的逐步重视，投入资金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总体来看，乡村教育投资力度仍然不足。必须完善乡村基础教育体制，保障村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新型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才能得到切实提升。只有这样，新型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激发和增强，主动投入到村庄发展等农业生产以外的活动中去，山区农村才会迸发出新的活力。

第三，教育可以帮助农民发展一技之长，提升新型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强化专业化生产。自我发展能力缺失是山区农民的一大特征，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为山区农民提供多层次满足个体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教育，帮助山区农民培养专业化的生产技能，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为人力资源优势。

最后，教育有助于新型农民摆脱小农意识束缚，促进新型农民市场意识觉醒。利用教育传播外界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激发山区农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欲望。这是农民市场意识觉醒的第一步。还应传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帮助新型农民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注重对村干部队伍、农民企业家以及农民实干家的教育，充分发挥这批人的带头作用。同时鼓励山区农民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批人是农村发展的希望，着重培养他们的市场意识和进取精神，使其与老一辈农民在精神面貌和生产技术上发生质的改变。总之，要强化农村建设，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骨干分子，狠抓新一代农民素质，形成新型农民敢于面对市场、勇于开拓市场的局面。

3.2 完善医疗设施，助力乡村振兴

新型农民的身体素质直接影响到整个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在农业活动、农村发展中应当占据基础性地位。新型农民身体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其健康水平的提高，更可以起到改善生活质量的重大作用。身体素质起来了，享受生活的意愿才强烈，进行农业生产就会更上劲儿。农民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施行才有保障。过去国家推行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战略，忽略了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村居民身体健康。今后，必须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巨大责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调动社会企业、公众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投资所产生的直接效益是明显的，作用是巨大的，只有山区农民身体健康得到保障，乡村振兴的基石才能夯实。

3.3 重建村社组织，助阵乡村振兴

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政经社”合一的村社组织是组织农民的最佳载体，可以通过多重权威调动、多重资源综合使用和多重规则综合运用，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满足农民公共产品需求，实现农村稳定有序发展^[12]。山区农村自然资源丰富，发展问题也相当复杂，建立综合性的村社组织，有利于多方统筹、统一调度，减小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阻力。通过村社组织的形式还可以把分散的农民聚集起来，在团队学习中相互竞争、相互学习，有利于增强新型农民学习效率，营造出和谐的学习氛围。新型农民培养需要村社组织的协调整合，通过举办科技文化宣讲会、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村社组织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统一经营能力”^[3]，助阵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4 结语

2020年，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区域仍然以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为主，尤其以地处西部山区的农村为主体。乡村振兴战略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乡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对缓解相对贫困意义重大，这项事业中，山区农村的特殊性问题不能回避。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山区农民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生产技能及市场意识，懂得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但山区农村广泛存在的思想文化素质低下、身体素质差、法律意识淡薄及市场意识薄弱等问题，依然束缚着山区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必须通过加大山区农村教育和医疗投资力度的方式，不断提升山区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从而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村集体等基层组织在统筹村庄资源及有效治理乡村方面大有可为，重建村社组织，构建新型农民与村集体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推动山区农村和谐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倩.农村校本课程开发与新型农民的培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20-222.

[2]李强,马中全.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对培养新型农民的指导意义[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90-92.

[3]夏柱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点[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2):22-30.

-
- [4]陈基平, 沈扬扬. 从关注生存需求到关注平衡发展——后 2020 我国农村向相对贫困标准转变的政策与现实意义[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2): 73-84.
- [5]陈方南, 李志云.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新型农民市场意识的培养[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40-44.
- [6]韩信传. 农民的历史比较及新型农民的内涵特质[J]. 世界农业, 2009(12): 30-33.
- [7]高圆圆, 范绍丰.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精神贫困探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6): 131-136.
- [8]徐小军.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新型农民培育[J]. 求实, 2007(4): 92-95.
- [9]迟福林. 以提高人口素质为重点强化农村公共服务[J]. 经济参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8(1): 17-18.
- [10]包先康, 朱士群. 公民教育与新型农民培养[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1(3): 119-125.
- [11]李丙金, 徐璋勇. 赋予选择权利和提高可行能力: 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养的核心[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2(6): 92-95.
- [12]高万芹. 村社组织再造及其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基于广东 Y 市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经验[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2): 11-21.